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袁筱一：翻译是成全他人也发现自己的旅程

□本报记者 宋 吟



袁筱一

在翻译中,对意义无止境地探索

记 者：袁筱一老师好,祝贺您获得鲁迅文学奖!得知获奖那一刻,您是什么样的感受?

袁筱一：感谢您!得知获奖的那一刻,有点不真实的感觉。收到第一条祝贺的微信时,我正在地铁上,真没反应过来,不知道被祝贺的是什么事情。可能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翻译,从来没有想过,会得到这样的肯定和奖励。在履历中,我总是会很骄傲地写翻译法语文学30余部,逾300万字,其实还有一条,从事文学翻译30余年。数字本身不算什么,却说明了一种坚持。此前我也拿过傅雷翻译出版奖和各种民间翻译奖项,都是专门的翻译奖项,而鲁迅文学奖当然是最令人向往和激动的,因为它不是把翻译当作“另一种”“低于”原创的文学来对待,而是当作写作的诸多形式之一。

记 者：三十多年的文学翻译生涯,您已成为中文世界读者进入法语文学的重要摆渡人。能否与我们谈谈您是如何与法语文学结缘,并决心从事文学翻译这项事业的?

袁筱一：我10岁就进入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,第一外语就是法语。当然,在中学里,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要做一个翻译家,那个时候,应该是和大多数在80年代初学外语的孩子一样,很抽象地想过要做一个外交家什么的。真正让我产生想要从事翻译的念头的是,在大学图书馆里,读了傅雷先生的译文,再对照着原文,觉得真是奇妙。后来又得到了《情人》的原文,拿着王道乾先生的译文来对比着读,也觉得有意思。可能要做文学翻译的念头就是那时候埋下的吧。大学毕业之后,幸运地进了南京大学做老师,同时也继续读硕士和博士,那个时候翻译理论与实践已经是外语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,我也就开始顺理成章地做起了翻译。回顾我的翻译史,我自认为我翻译的第一部法语小说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《战争》,但是这样说不完全对。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,我翻译的第一部法语文学作品是我自己用法语创作的小说《黄昏雨》,是在我的小说得奖之后,《中国青年报》的编辑要求我翻译的。现在想来非常有趣,当时翻译自己的作品,我觉得自己作为译者的权力应该比较大,可以说是将翻译当作原创来对待的。我在1994年翻译勒克莱齐奥的《战争》,也第一次尝到了“戴着镣铐跳舞”的滋味。有界限的自由比无限的自由更有吸引力。因为在不断地经历语言的陌生化过程,译者对于两种语言的敏感性会与日俱增。这是翻译最令我着迷的地方,对意义的探索永无止境。

记 者：1992年,您以小说《黄昏雨》获得法国青年作家大

奖赛第一名,1994年开始进行文学翻译,虽然您此后专注于文学翻译,但从时间看来,您的写作是略早于翻译的。写作对您的翻译有影响吗?您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?

袁筱一：《黄昏雨》是偶然的写作,获奖对我的影响就是它让我走上了与文学相关的道路。翻译也是一种写作。无论是原创,还是翻译,都来自阅读,来自理解他人、走近他人、和他人交流的愿望。差别就在于,原创更像是在等待他人的走近,而翻译有一种主动走近他人的姿态。二者并不矛盾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也都出现过身兼翻译家与作家的身份的人物。我觉得能够做翻译是挺幸运的,因为不用担心灵感枯竭。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调查,我相信翻译家比单纯的作家要少些焦虑。



《战争,战争,战争》,[法]蕾拉·斯利玛尼著,袁筱一译,浙江文艺出版社,2024年10月

记 者：您翻译生涯的第一部译作是勒克莱齐奥的《战争》,多年后又译了蕾拉·斯利玛尼的《战争,战争,战争》。两部书名相近、气质却迥异。翻译这两部作品时,您感受到的最大不同是什么?

袁筱一：确实很有意思。两部作品虽然都有“战争”二字,但它们所书写的“战争”其实完全不同。勒克莱齐奥的《战争》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,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小说。这里的“战争”更多是一种象征,它指向现代文明中的一种普遍状态: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社会之间、人与自身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,这种紧张关系或许是现代战争的真正来源。勒克莱齐奥通过大量碎片化的感官描写、城市景观和现代生活经验,表现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异化。因此,翻译这部作品最大的挑战,是如何处理他的语言风格。勒克莱齐奥的文字非常特殊,它不是靠情节推动,而是靠语言创造一种感受。大量重复,跳跃性的意象,诗性的节奏,共同构成了作品的精神氛围。作为译者,不能只是把句子翻译出来,还要努力把原文中的节奏、压力和陌生感带入中文。如果把它译得过于顺畅,反而会失去勒克莱齐奥文字中那种不安和震动。

翻译蕾拉·斯利玛尼的《战争,战争,战争》,我面对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。蕾拉写的是具体的战争,二战结束之后陆续到来的非洲独立战争,她关注的是战争和历史如何进入普通人的生命,是殖民历史背景下个人、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变化。她的语言非常现代、简洁、克制,但叙事又很传统,她非常懂得通过细节、动作和人物关系,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留下的伤痕。所以翻译蕾拉时,最大的难点不是语言的复杂,而是如何保持语言的克制和由情节推动的快板式的叙事节奏。也就是说,如果说勒克莱齐奥的《战争》要求译者进入一种语言和感知的世界,那么蕾拉的《战争,战争,战争》则要求译者进入一种历史和生命经验的世界。

这一次,请用我的眼睛看新疆!

□[埃及]米拉·艾哈迈德

动人的词句!

终于,命运给了我一次惊喜的新疆之旅!没错,一定要是个惊喜,这样才能加倍快乐。我看到了一个现代化和都市化的新疆,也看到了文化习俗和文化遗产的传承,这些古老的传统在发展得以保留。我仿佛听到新疆人民在说:“我们在发展、工作、进步的同时,也在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。我们在前进,但不会抛弃过去,也不会轻视过去。过去塑造了现在,过去和现在也将塑造未来。”在新疆这片土地上,我懂得了真爱、安全、友谊和兄弟情谊的真谛。我是他们的客人,而我感到自己也是他们的一分子。我记得有一次,我感觉很热,走进一家小铺子,撕下一张纸来扇风。老板拿出一把扇子递给我,我问她多少钱,她说:“呵呵,送你的!”就算不认识,他们也会送你礼物,也许别人觉得这些礼物微不足道,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。

这里应有尽有:山峦、流水、平原、美丽的景

色和美味的食物。这里有舒适、宁静、真挚的爱、兄弟般的情谊和温暖的拥抱。人们随着乐师的演奏和舞者的翩翩起舞,忘却烦恼和忧愁,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。这里汇聚了众多民族,但感受不到彼此的差异,我们都是人类,因人性的最高境界——爱——而紧密相连。

让我们为爱唱歌、舞蹈、呐喊:
新疆多么甜蜜! 新疆多么美丽!
哦,爱! 哦,温柔!
拥抱我吧,新疆!
洗去我所有的痛苦和伤痕!
我疲惫不堪,痛苦万分!
或许无人能感同身受,
但你感受着我,并给予我希望!
歌唱吧,新疆,用希望歌唱!
用爱和温柔歌唱!
拥抱我,与我共舞生命的舞蹈!
因为你,新疆就是生命本身!

我参访了许多地方,每一处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新疆这片土地的富饶。吐鲁番交河古城令我印象深刻。这座古城历经岁月的变迁、战火的洗礼,至今依然傲然屹立于世,其神圣与庄严令人敬畏。踏入城门的那一刻,我便感到一股敬畏之情涌上心头,一阵战栗掠过全身,被这地方的宏伟壮丽所震撼。我沿着石径前行,左右两侧都是嶙峋的岩石,但这些岩石仿佛出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手,精雕细琢。我凝视着每一块岩石,仿佛它们都以其独特的形态传递着某种特定的信息。我继续前行,如痴如醉,如同一个小女孩走进梦境之城,被眼前的一切深深吸引。

我走得越远,就越被唐代建筑遗存的壮丽所震撼。漫步其中,仿佛置身于古老的历史长河。我想,路的尽头是什么并不重要。它们充满魅力,能带来全新的体验。我开始用手机记录下眼前的一切,记录下这些特殊的历史瞬间。车开走了,最后回头望了一眼这座古城。一

是简单书写战争,而是书写战争如何进入人的生活。蕾拉关注的是历史大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,因此译者面对的不只是历史词汇的转换,更是不同文化经验、情感方式和生命经验之间的转换。小说中,两种文化、两种语言一直在较量和纠缠。作者是用法语来描述“异文化”和“他者文明”,翻译时经常需要处理这种“他者的他者”,例如法语拼写的阿拉伯语,还有一些法语里并不存在的、和阿拉伯传统文化相关的词汇。与此同时,蕾拉的语言非常克制,很多时候力量恰恰存在于没有说出的部分,译者需要尊重这种留白,在中文中保持原作的冷峻和张力。

记 者：在《战争,战争,战争》翻译过程中,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地方?

袁筱一：让我印象最深的,还是蕾拉语言本身的节奏。她的法语非常简洁,但这种简洁并不意味着简单。她往往用非常少的文字留下很大的空间。翻译的时候,最大的诱惑就是把它写得更好看,让中文更加流畅、更加符合文学表达习惯,但后来会发现,有些地方恰恰需要保留原文的“零度写作”风格,因为那正是作者建立叙事力量的方式。从《温柔之歌》开始,就有人开玩笑说,译作比原作更精彩。幸亏是个玩笑,否则我可能就觉得自己的翻译失败了。而这个玩笑也和蕾拉转述过,她倒是并不是在意。也许因为她就是真正的双语人,她很理解译者的工作。

“直译是要成为照亮原作的光,要成就他者”

记 者：作家的语言与翻译家的语言之间往往存在巨大不同,这种不同也迫使译者做出翻译观念上的选择。在您过往的文学翻译实践中,您秉持怎么样的翻译原则与观念?

袁筱一：我的翻译原则与观念很明确:就是直译。直译不是字字对译,不是一种翻译的方法。直译是立场,是尊重他者,是不将自己的译作看作是翻译的终点,是不因为目的的读者不懂原文就进行欺瞒,随意地增加、变化和删减,是不以追求不朽的译作为翻译的目的性,是不替想象中的译文读者做选择。事实上,译作不会不朽,越“漂亮”的译文越可疑,也越容易过时。也就是说,直译是要成为照亮原作的光,要成就他者,而不是成就自己。

记 者：您曾重译过法语文学名著,名著重译也是翻译界常讨论的话题,您认为一部经典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新的译本?译者如何面对前人的“影子”?

袁筱一：我翻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当代的,是需要购买版权的。我只重译过两部作品,一部是卢梭的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,另一部是加缪的《西西弗神话》。翻译卢梭的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是一种实验性的行为,那个时候我还身处自己的浪漫主义时代,因而想要通过翻译卢梭来解决正视自我的问题,但其实我并没有在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中找到答案。翻译的过程极其痛苦,以至于我下决心在未来都不要再碰卢梭。不是因为卢梭难译,而是我发现自己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和浪漫主义做了清算。另一部重译的经典是加缪的《西西弗神话》。原因很简单,我很喜欢加缪,那段时间我也正在我的文学课上讲加缪,我需要通过翻译来接近他的思想。从最终结果来说,这两部重译的经典都比较受欢迎。《西西弗神话》最近也再版过。对于我来说,我轻易不会接受重译经典的邀约,除非有特别的原因。前译的存在是比较重要的原因。通常我译完了之后才会去看前译,就是为了避免前译的影响,也不想因为需要刻意回避就乱了方寸。但是我译完后会读前译,我也会根据前译来调整一些我自己译的欠妥的地方。对于我来说,我认为每一个严肃的前译本都是给了我借鉴和帮助的,例如郭宏安老师翻译的《西绪福斯神话》。

记 者：在您看来,法国文学在不同时代对中国读者的吸引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您接下来还有哪些翻译或研究计划?

袁筱一：从我们熟悉的19世纪法国文学到我们相对不那么熟悉的20世纪法国文学,是继承与反叛的关系。文学史家贡巴尼翁说过,20世纪法国文学是艰涩的文学,因为文学赋予自身的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的翻译作品基本是20世纪以后的法国文学和法语文学。我其实还有一项研究过程中产生的翻译兴趣,但不一定都能进行。比如我想重译福楼拜,我最爱的作家之一。我也想译萨特写福楼拜的《家庭白痴》。不过,目前确定的是要把蕾拉“他者之乡”三部曲的第三部翻译完成。



股莫名的力量涌上心头,我感到我们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。我来到这座古城并非偶然,而是命中注定。车开走了,这些话语在我心中久久回荡:

我如山岳般巍然屹立,不为风雨所动
即便化为废墟也无妨
你将在废墟中寻得智慧
我们之中,谁不曾生活在废墟之中
从智慧、宏伟和岁月的经验中汲取灵感
来吧,我将赐予你历史的智慧
(作者系埃及汉学家)



九年前,我幸运地获得了一个绝佳的机会,翻译王蒙先生的小说《这边风景》。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新疆。当时,我对新疆一无所知,不了解那里的情况,也不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。透过字里行间,我逐渐了解了这片土地及其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,从城市到乡村,无不让我沉浸其中。我常常闭上眼睛,仿佛身临其境。王蒙先生的描写栩栩如生,让我感觉仿佛真的去过那里,尤其是他对丰收、聚餐、对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以及田野里牲畜的刻画。他还介绍了新疆少数民族的状况、习俗和传统。我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每一个细节,多么渴望能去新疆看看!这份渴望伴随了我多年。每当我看到有人发旅游的照片,我都会感慨:新疆,我什么时候才能去你那里?答案是,也许有机会,也许没有,即使我去不了新疆,我也能够透过王蒙先生的眼睛去感受它。还有什么比王蒙先生对新疆的描述更美的呢!他把新疆当作自己的第二个故乡……多么